

由于对补偿方案不满,在将近4个月时间内,梁培和另外13户社员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,武广铁路施工因此被迫中断——

# 118天：一条铁路与14个“钉子户”的利益之争

本报记者 王舒怀 傅丁根摄影报道

“其实,我们并不是钉子户。”2月12日,坐在记者面前,广州市荔湾区增滘经济联社社员梁培(化名)用这句开场白否认自己和那个字眼之间的联系。

一个月之前的1月13日,梁培与同社另外13户社员,在一份拆迁协议上最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数小时之后,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房屋,在钩机与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。再过一年,一条纵贯华南三省,全长900多公里的客运大动脉——武广客运专线即将在这里通过。

早在2008年9月17日,社里另外61户拆迁户便已签订了拆迁协议。但由于对补偿方案不满,自那时起将近4个月时间内,梁培和另外13户社员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,被外界称为“武广铁路14个钉子户”。武广铁路施工因此被迫中断。

“我只是想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利益”,梁培为自己辩护说,“其实,我们都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。”

不仅仅是梁培。从头至尾,“钉子户”们都将“支持国家”挂在嘴边。没有人在口头否认武广铁路的重要性,但是,在具体利益问题上,社员们寸步必争。这一争,就是118天。

## 一条铁路与一个村庄

梁培,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社员,高中文化。他对自己的称谓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打过工,做过小生意,现在依靠帮人运输花卉谋生。1998年,他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,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。“这是我唯一一所房子”,他说。

类似的小楼在这个富裕的广东村庄中并不少见。1998年的时候,当地盖这样一座小楼,造价大约是每平方米800至900元,建筑面积100至500平方米不等。

增滘联社位于广州市西部,毗邻珠江,下辖南约等8个二级社,是个典型的“城中村”。上世纪80和90年代,与当地许多村庄类似,增滘联社曾经依靠出租集体土地获得了不菲的收入,“多的时候一年上百万”。然而,随着城市的发展,联社手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。“原来有3000多亩地,现在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地不足300亩了”,增滘联社副社长梁兆威介绍说。

2005年6月23日,国家重点工程项目——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在长沙首先开始动工。据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介绍,这条全长968公里的客运专线是“我国目前线路里程最长、技术标准最高、投资最多的铁路客运专线”,设计时速350公里。由铁道部代表国家,加上广东、湖南、湖北三省组成四大股东,地方政府主要以土地作为本金入股。这条铁路恰恰从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的土地上穿过。根据要求,铁路两侧20米控制区以内的房屋需要拆迁,共涉及75户社员,其中包括梁培,也包括梁兆威。

2005年底,广州市荔湾区武广铁路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办公室(简称“武广办”)成立。2008年7月,“武广办”开始面向社员签订拆迁合同。“最初的工作目标是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拆迁。”负责人赵志鹏说。

39岁的赵志鹏来自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,多年从事城市征地拆迁工作。不过,如今他承认,“从后来事件的发展看,我们一开始就低估了工作的难度。”

## 补偿标准之争

2007年底,在完成国有厂房及集体土地补偿工作后,“武广办”便开始着手将拆迁政策初稿发放给社员,同时征询社员意见。从2007年到2008年7月,“记不得开了多少次会,每一次都吵得不可开交”,补偿方案数易其稿。

2008年7月,最终补偿方案获区政府通过。“这是综合考虑财政支付能力、地区经济条件及房价上涨、村民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后的结果。”赵志鹏介绍说。

根据这份补偿方案,被拆迁社员如果选择全弃产,可获得每平方米最高4200元的货币补偿,如果选择复建房,补偿标准则为拆一补一,此外还发放每月每平方米20元,为期两年的临迁补助。

多数社员接受了这个方案,社员代表梁国祥第一个在协议上签了字,梁兆威紧随其后。

梁国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“说是拆一补一,实际操作中,‘拆’按建筑面积计算,‘补’按套内面积计算,再加上临迁费和装修补助,完全可以弥补当年的建房

成本,外加白得一套房。”此次拆迁中,他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。

不过,梁培等人并不这么认为。在他们看来,补偿标准依然过低了。

在赵志鹏那里,记者看到了“钉子户”发来的一份传真材料,其中向“武广办”提出10点疑问,并给出两个赔偿方案。其核心是“要求按照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,每平方米7500元进行赔偿,同时首层房屋‘拆一补二’”。

“钉子户”们举出荔湾区花地河边某楼盘为例,“最红火时每平方米卖到15000元,为何只赔我4000多元?”

据了解,目前,荔湾区普通商品房售价仍在每平方米7000—10000元左右。

赵志鹏也承认,如果被拆迁户只拿到每平方米4000多元赔偿,“在同一地段是买不到房子的。”

“钉子户”们亦举出广州其它地区的拆迁标准为依据,“比如南海黄岐、里水等地拆迁,就是拆一补二。”

但是,赵志鹏指出,拆迁补偿价格是根据该地区楼盘的平均状况进行评估确认的,而不是某幢楼盘的最高价格。更重要的是,这次拆迁是出于国家公益事业的需要,对集体土地上的个人附着物进行赔偿,不同于个别繁华地段的商业开发。

至于为何不能“拆一补二”,赵志鹏的说法是“我们在政策上找不到支持。”

“钉子户”们的另一个顾虑,是复迁房能否如期交到他们手上。截至2008年7月,复迁房刚刚从广州市规划局获得选址意见书,许多手续尚在办理之中。这座“纸上楼阁”未免让部分社员感到不踏实。

赵志鹏说,为打消拆迁户这种顾虑,“武广办”曾经设想过先将补偿款发到拆迁户手中,复建房完工后,再由拆迁户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成本价回购的方案。

“但算一下,这种方案要多拿出1个亿,财政吃不消。”据了解,荔湾区在整个武广铁路拆迁中,为国有厂房、集体土地和拆迁户付出的补偿款总额为2.9亿元。

2008年9月17日晚12点,是“武广办”划定的签订协议的最后期限,75户拆迁户中,有61户签订了协议,余下的14户则坚持着自己的诉求。

舆论之战

9月17日起,为做通“钉子户”的思想工作,“武广办”与社干部多次上门与之谈判,却一次次不欢而散。

也正是从那一天起,14户人家相约,每晚8点在村头榕树下喝啤酒,以示同盟关系。“只要不刮风下雨,到哪里准能找到他们。”一位“武广办”工作人员对记者说。



2月12日,一名工人在武广铁路一处桥墩上施工。不久前,这里正是“钉子户”的房屋所在。

梁兆威是社里第二个签协议的人。作为社干部,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,结果“他认为我背叛了他们,现在连话都不讲了。”梁兆威对记者叹息道。

据知情人介绍,利益之争的背后,其实还有着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原因。

增滘联社80%的社员姓梁,分属于5个不同的祠堂。“一方同意的事情,往往另一方就会反对”,一名社员对记者这样形容社中的关系,“就算每人发1000块钱都会吵架。先发谁,后发谁,谁的新,谁的旧,都是问题。”

涉及拆迁的75户人家中,有多家以种植花卉为生。生意上的竞争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间的隔阂与矛盾。此外,2008年底,正是南约生产社干部换届选举的时候。能否在拆迁中为社员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,亦成为参选干部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。

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这一天起了变化。

这一天,“武广办”将已经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单位。进场施工的工人却与未签协议的社员发生了冲突,两名社员被打伤送进医院。

两天后,广州某晚报以《拆与不拆 扯火冲突》为题,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次冲突。根据该晚报的报道,当天,面对轰鸣施工的机械,居民因“担心安全”而“上前劝阻”,“70岁的镜叔干脆站上了钩机的轮带,此举令不远处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满,双方争执不下……纠缠中,几名老人被撞倒在地,有的手被夹伤,矛盾进一步激化。”

报道在网络上迅速被转载,对于“钉子户”的同情之声四起。荔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吴永祺承认,荔湾区及“武广办”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,“造成了我们那段时间工作的被动。”

为了“占领舆论制高点”,挽回工作主动,在区宣传部协调下,“武广办”开始主动向媒体靠拢,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,先后4次组织媒体前来报道,无论是冲突还是事件处理,都积极通报进展情况。

“广州媒体竞争激烈,老百姓喜欢‘爆料’,所以我们要主动‘爆料’。”吴永祺说。

铁路方也学会了向媒体大诉苦水。那段时间,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反复向媒体提及的一个数字便是:每停工一天,因施工队伍、机械停工而造成的国家损失高达50万元。

政府的主动“爆料”和开放姿态使得舆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多数媒体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客观报道,网络的转载使“钉子户卡住武广线”一时升级为公共话题。舆论环境迅速朝着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。12月30日,《广州日报》对此事配发的评论为《保护私权不能伤及

国家利益》,《新快报》则援引相关法律指出《如拒执行裁决将可依法强拆》。

## 最后的博弈

2009年1月1日到13日,14户人家陆续签订了《补偿安置协议》。

1月14日,广州数家媒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:《武广线拔除最后两“牛钉”》。

从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内,到底发生了什么,令梁培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诉求?

“我们打的是‘温情牌’”。赵志鹏说。

“突破口”从送进医院的被打伤社员开始。“武广办”派人买花买东西送到医院,看望伤者,顺带趁热打铁,做通工作。

一些社员对“武广办”不信任,“你们这是个临时机构,过几天就撤了,有了问题我们找谁去?”

2008年12月22日起,荔湾区由区委副书记罗思源挂帅,从信访局、法制局、维稳办等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前往增滘“公关”,不少区领导亲自出面同“钉子户”谈判。工作组利用元旦集中与“钉子户”谈判,“分头包干调解,白天去晚上去,一天去几趟”。

一名“钉子户”对复迁房如期完工有疑虑。“要是建成烂尾楼怎么办?”“如果你有担心,把我的房产证押给你好了。”荔湾区副区长陈玉亮这样表示。

区领导的出面,让部分“钉子户”感到“多少有了点面子”,也乐于“下个台阶”。

“我们最后是被各个击破的”,梁培承认说。

最终的结果不免让“钉子户”们有些沮丧。3个月的坚持,他们不仅未争取到任何一点额外利益,还比首批签约拆迁户每平方米少了50元补偿。

“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,以区别于那些首批签约的拆迁户”,赵志鹏说。

不过,在补偿标准之外,“武广办”及荔湾区政府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与让步。

“我们帮他们中的一些人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”,荔湾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荣元说,“在就业、入学、养老等与拆迁无关的问题上,最大限度给以协助。”

“不过,从根本上说,这说明我们的补偿方案能够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。”赵志鹏说。担任“武广办”负责人一职以来,他自嘲自己“头上添了许多白发”。

寻找平衡点

争执不下之时,“武广办”曾经想过申请法院强拆。“但等不及,一进司法程序,至少要半年时间。”

幸而事件未发展到“兵戎相见”的地步。回顾与“钉子户”之争,赵志鹏总结认为“前期工作如果更细些会更好。”

“整个拆迁期间,政府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,来不及考虑清楚。”梁培对记者报怨道。

不少区政府官员承认,对于拆迁户而言,拆迁意味着他们从独门独户的居住转变为公寓式居住,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,“肯定是做出了牺牲”。

拆迁期间,亦有社员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出质疑:早在2003年就有征地的消息传出,为何五六年过去了,连块复建房的地都没选好?

赵志鹏对此的解释是,2003年只是有关部门打意向,真正的工作是2005年后开展的。此外,在复迁房选址工作中经历了波折,第一次选址因过于靠近铁路未通过环评,不得不重新选择。不过他也承认,如果把前期工作做得更扎实些,“把建好的复建房放在村民面前,工作肯定容易得多。”

“对地方政府而言,现在拆迁工作不是第一难,也差不多是最难的。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政府官员这样感慨,“为何如今钉子户层出不穷?从一个钉子到一个钉群?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。”

这名官员指出,在拆迁问题上,香港同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。“比如说与拆迁户的谈判工作,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向专业社工购买服务,利用其专业经验出面沟通,效果好而且不易产生冲突。但我们这里,是政府将这部分沟通、安抚的职责包揽了下来。”

黄荣元则认为,“对于政府来说,必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。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。”

“现在就是保佑复建房按期交付吧。”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,梁培面对记者不愿多谈,这句话已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。

## 观察·上期回声



《国产动画:春暖未必花开》,2月24日14版《社会观察》

## 动漫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

动漫作品是离童心最近的文化艺术。儿时欢娱的文化情结因其植根于心灵最深处,而对人的一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优秀的动漫作品能从童心出发,从国情出发,在润物细无声中对价值取向、道德意识、进取精神、创新能力、行为规范进行渗透式培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力扶持国产动漫产业,也就是打造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软实力。

过分强调寓教于乐,导致国产动画创作的畸形,只因忽略了从童心出发。一味搞笑找乐、搞怪低俗、不分良莠地引进,在吞噬孩子纯真的同时,也一步步丧失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软实力。

陕西西安市 靳多琳

## 动画艺术需要下苦功夫

我出生于50年代,记得当年经常同小伙伴一起去影院看《大闹天宫》、《半夜鸡叫》、《草原小兄妹》等动画影片,真是百看不厌。

当时动画影片制作是政府主导,没有自负盈亏之虑,制作人也是吃大锅饭,可人们却有一种集体观念,一种民族情感,一种为艺术贡献一切的精神。在制作中,大家都是精益求精,经过数十遍的修改和完善,这样问世的作品多为精品。

现在我们的动画片,主要是文化产业机构自己组合,自己选材,自己制作,在经费上也是自筹资金、自负盈亏,政府给予的支持相当有限,因而,造成各文化产业机构出于成本的考虑,求多求快,难保质量。动画是一门艺术,艺术需要下苦功夫研究,耐心地培育。不然,要想制作出好作品,那是异想天开。

福建龙海市 邓溪清

## 应多考虑孩子的感受

记得前些年,有关部门引进的国产动画片《机器猫》、《名侦探柯南》、《美少女战士》、《蜡笔小新》、《樱桃小丸子》、《灌篮高手》等,让孩子们很快上瘾,神魂颠倒,就连许多成年人也产生浓厚兴趣,由此可见动画片的魅力。

动画片的好与坏,不能用成年人的眼光、观念来评价,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孩子。所以要在少年儿童的角度,设计制作动画片。同时还应该虚心向日本、欧美等国家学习动画片的设计思路、制作技巧,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动画片的质量,使我国的动画片不但“春暖”,还要“开花结果”。

辽宁锦州市 常 纯

## 有文化内涵才能打动人

尽管我都上大三了,但还是对一些儿时热爱的动画片念念不忘,比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、《猫和老鼠》。前者是一部典型的“中国式”动画,当年在国际上屡获大奖,典雅的东方美打造出了一个乃至几个时代崇尚的经典之作。后者虽然无言无语却有情有义,诙谐的故事,夸张的想象,强烈的动感,雅俗共赏,让人欲罢不能。

两个截然不同的动画片所代表的,是两种不同的文化。我认为,好的动画片最打动人地方之一,是它的文化内涵。地域特色、民族品质、国家精神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、表现方式、背景音乐等要素展现出来,越是淋漓尽致,就越能“俘虏”观众的心,而这样的片子在观众年龄层上也常属于“大小通吃”。动画,不再是小孩儿的专有。

陕西安康市 范雅超

责任编辑:周 朗

电话:(010)65368729

传真:(010)65368744

电子信箱:rmrbshgc@gmail.com

欢迎读者提供新闻线索、发表评论感想